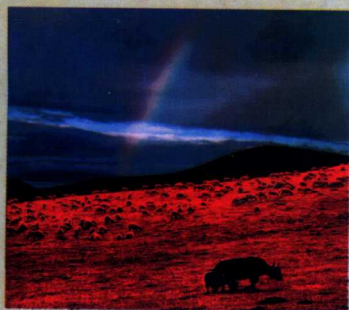


末世苍茫

中华传统文化随谈丛书

吴方 著



中国哲学的智慧
境界宏阔、气魄高洁
禅宗、心学、道教……
皆清人耳目、发人深省
可以相亲

细说晚清思潮

云南人民出版社

末世苍茫

细说晚清思潮

中华传统文化随谈丛书

末世

吴方著



00902841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书号

B250.5

W34

4

主 编:葛兆光

组 稿:瞿洪斌

责任编辑:黄 源

封面设计:西 里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仅限中国内地销售

末世苍茫——细说晚清思潮

吴 方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邮编:650011

番禺市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字数:116000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222-02124-8/G·236 定价:12.6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1996—010

目 录

“且听上回分解”(代引言).....	(1)
“笼”里人物尽白头.....	(7)
避席畏闻文字狱	(13)
乾嘉之学	(17)
补说戴震	(22)
“中世纪”的怪圈	(27)
百年忧患第一人	(31)
天地东西南北之学	(37)
狂来舞剑 怨去吹箫	(43)
“经世致用”的旧瓶新酒	(49)
西学之开端	(54)
青史凭谁定是非	(59)
由“道器”说到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65)

“海上苏武”叶名琛	(71)
“天国”悲剧	(76)
曾国藩与传统秩序	(82)
“湘乡”之学·曾氏“工夫”	(89)
走向世界的“取经者”	(95)
晚清一桩怪事	(101)
由白衣秀才到宣传变法的政论家	(105)
“报国无门”容纯甫	(111)
保守派·洋务派·早期维新派	(117)
由旧趋新与“六经之外”	(123)
解铃还需系铃人	(129)
亦商亦士郑观应	(135)
清流、清议一瞥	(140)
卫道者张之洞	(145)
“中体西用”面面观	(151)
戊戌变法：又一场难圆之梦	(157)
“帝阍沉沉叫不得”	(163)
书生改制 野狐谈经	(171)
康有为的《大同书》	(177)
凌云健笔意纵横	(182)
试思“梁启超现象”	(187)
思想界慧星谭嗣同	(194)

末世苍茫

铁马丁当入梦来(关于严复)·····	(200)
“士”的风格与章太炎·····	(208)
曲终人散 满目夕山·····	(215)
白发书生寂寞心·····	(220)
后 记·····	(228)

“且听上回分解”(代引言)

我们且试把历史当作分章回的一本大书来看，那末眼下的世纪好像已近尾声却尚未写完的一章，而十九世纪呢，则肯定如刚翻过去的上一个章回，尽管觉得已是相当遥远的事了。讲历史，往往欲说近事，先叙远缘，改了小说家的一句套话，叫作“且听上回分解”。

十九世纪在中国，正值末代王朝——清朝的后期，一百年间，不乏戏剧性。开头赶上嘉庆即位，做了六十年皇帝加四年太上皇的乾隆终于死去。史家所谓“康乾盛世”一去不返。末尾，光绪时，正逢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庚子之变（闹义和团及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一连串的事件。中间又有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及西潮东渐、洋务运动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回头看，世事如麻。

清史近三百年，从正式定鼎算起(1644年)，一共十个皇帝坐龙廷。从前一幅对联有道是：

顺天康民雍然乾道嘉千古

治国熙世正是隆恩庆万年

联语挺俗，却凑巧把清朝前五个皇帝的年号嵌进去了(两联的奇数字分别组合)，最后是嘉庆。按对联的意思，似乎嘉庆正该承上启下，延清祚于千年万载，但世事难卜，常常结果与愿望恰恰相反。好局面不长，从道光开始，清朝的天下颇不太平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不到一百年，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终于塌台。如果将顺治到嘉庆这一段称为清朝统治的上行期，那末，从嘉庆开始的十九世纪恰好正是清王朝气数由盛而衰的下行期。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思想也格外震荡的时代。

人们爱用“下棋”来比喻世情人事，譬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话。可是说到十九世纪中国的这一局“棋”，可就不仅“当局者迷”，连旁观者也不容易看得清楚。本来那一套传统的套数、应付局面的“定式”、“走法”，到这时想不到全不大灵验了。显然，对于这一“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历史学家特别指出，是西方列强用军舰大炮的冲击波，给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震动、摇撼。话虽说如此，但只是

说到了中国所遭受西方压力的一面，并未讲传统中国文化的反应如何。实际上，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对外来挑战的反应，第一是缺乏准备，第二是过程十分艰难，第三，结果呈悲剧性……这可能会激发产生反省意识的思考：曾经高度自我完善、与本土生活相融合的传统思想体系，在十九世纪局势的冲击下，是否暴露了它自身的问题？

虽然当时内忧外患，已经有许多的难题、麻烦，但恐怕最要紧的问题，首先还在于是否认识到自身有问题。“变”与“怎样变”，也首先需要将看世界看自己的态度变一变。然而就这么一回事也很不容易说通，所以说在中国改革的阻力总是很大的。譬如，甚至已到了同治年间，大学士倭仁还在那里反对国家招考学习天文、算学的人员。他的理由是讲，凡学问都以中国为最好，根本用不着向外国去学习。他这么自信，别人就说，“既然如此，那末就请老先生保举出几个人来吧？”然而倭仁虽然保举不上来，却还是要固执下去。而且当时这种固执还盘据于不少人的头脑中，如知识阶层中亦尚有不少人抱有华夏第一的文化优越感，不肯抛弃“中国乃天地之中”的想法。直到清末，湖南的叶德辉还说：“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开天辟地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见《翼教丛编》卷六）简直是强

不知以为知，自说梦话了。

细想，许多事并不宜于一笑置之。因为除开对世界的认知是盲目的以外，即使几个有识之士，要朝外打开一点儿思想的窗户，也很难。“势”难扭，自因这“势”里有上千年定势的积淀和制约，从思维内容到思维方式以至于文化心理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 拿清代十九世纪的思想来说，它与传统的关系，好像驿站与传输系统的关系，还是被规定着的。尽管有它的个性和变化，又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受“前有”、“前见”（借伽达默尔的说法）的制约。

“前”有前因。儒、道、法、释……思想意识经过上千年的接触、互渗，形成与本土相适应的一套观念，在器物技能层次、典章制度层次和思想行为层次分别得到反映和落实，形成变化可能性较小的定见。这种自我确定的惯性，其弊在于很难能创造性地提出新问题来，久之，造成一种思想路向极为狭窄的常规思维类型。例如一代代学人都将精力与智慧反覆投入到经学研究的磨道里去，大儒智者无不把眼睛往古看，企图在上古的道德遗训中获得规范现代行为制度的准绳，回归到经典所陈述的世界中去。这样，虽然也产生了关于人生、社会的许多精微见解，却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导向”，对“变”的理念的本能拒斥。

中国古代思想之大系，概略言之，由先秦子学到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又到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无论是讲名实、道器、理欲、知行、体用，还是讲人法、义利、德才，无论是儒道互补，还是阳儒阴法，大体总归绕着“内圣外王”来发言。“内圣”为讲究人心的“修身”，“外王”为讲究外物的“治平”。总之是寻求一种人的精神世界和彼此相互关系中的合谐秩序。“天人合谐”也是讲人际关系的，即按一定的伦理纲常来“秩序”，如果不能用教化来维持，便用征服来维持，似乎上千年的历史总离不开“秩序”的主题，连民间市井的小说戏曲也常常如此：人们喜欢看到有英雄好汉、志士仁人、剑客侠女、明君清官出来，惩恶扬善，维持或重建秩序。但是历史还是带来了一个新问题：这样的秩序能否适应变动的时代（如光绪在上谕中也承认：“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它是否扼制自由的创造性的思想行为？换言之，它是否以牺牲社会发展的动力为代价的？在这儿，秩序和动力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当十九世纪悄悄降临于一片古老土地上时，紫禁城的早朝仍像往常一样按时开始，一辆牛车正在乡间土路上发出吱吱的声响，而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一幕可能已经开始。只不过，人们也许还根本未意识到什么，未发现有什么问题。有苏格拉底的想法——“未经

审视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的人毕竟不多，而事实上人类和人类思想的进步部分，毕竟是不断提出问题和反省自身经验的结果。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

“笼”里人物尽白头

思想者往往先是读书人。有两句老话说得挺凄凉：一句是“人生识字忧患始”，另一句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许多书生、士子虽然常以凄凉自况，还是免不了要“忧患”，要“用世”，当然更不免有追逐名利的。退一步说，这样那样，他们总归还得扮演时代要求于他们的社会性角色。

总的看，追溯思想的历史，其实也就是看某个时代的理性在社会行动系统中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从这一点去看，十九世纪初叶的思想者们起的作用很微妙，他们近于一种适应性的角色。这和明末清初的情形大不一样了。那时满人挥师入关，江山易帜，一些具有启蒙思想意识的明遗民，在孤独中发挥了一些特异的思想，正是“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然而历康

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清朝的统治秩序已稳定下来，而且文治武功一时还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统治者是有办法的，“拉”与“打”，是用来对付读书人的两手。

随着岁月冲刷，已不复有产生清初思想家“异质性”思想的土壤。思想者当然还得选择自己的方向，但选择不能不受环境的限制，更不能不受支配社会结构的规范和价值观的诱导和约束。

诱导、约束、限制，在清代的科举制和文字狱里面。

话说“科举”，本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中“选干部”的系统。当然，作为笼络方式对历代读书人也最有引诱力。科举在唐代定型，后世皆承唐制。其效果是否真如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呢？大概“入彀”是不错的，至于是否“天下英雄”，则颇成疑问。其实事情明摆着，即使科举中真不乏出类拔萃者，登第后也只能按照体制的规定去扮演角色，出格是不行的。况且其才能多半只能表现于四书五经之学和做八股文的本领上。万千学子寒窗苦熬的原是不切实际的学问。连康熙皇帝也明白：“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不仅人受牢笼，思想也跑不了。

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能站稳脚，其明智处在于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低度文化”，所以欲“制汉”，必须承袭明朝的思想、制度基础。恢复旧式科举并设“博学鸿

词”科，都属于延揽人心的姿态。“博学鸿词”，由地方督抚及大臣推荐人选，只要颇具声名的皆可录取，名高者多授翰林馆职（俗称“野翰林”）。不过清初时像顾炎武、黄宗羲、李二曲、傅青主这些人是死也不肯受召的，只是时间一长，作为适应性角色的读书人也没了别的出路，渐渐适应这种“坑陷天下聪明才力之士”的陷阱，且以为是人世的唯一津梁了。人们会对牢笼式的文化环境逐渐适应起来，不觉地失掉自我。蒲松龄的《聊斋》对此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闱场也，神情恼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縶之獠。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情猝变，嗒然若死，则似蝮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

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科举制度也不是一无可取，譬如说有个合理的形式，但这条太窄的路，实在是把产生新思想、新探索的可能性加以无形扼杀了。甚至举业最后落到成为卑劣欲望的工具，“敲门砖”，便成了它的代名词。吴敬梓《儒林外史》曾借马二先生的口，说道：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期，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倘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

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

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事情到了马二先生说的地步，也还谈什么“道”、“理”、“仁”、“德”，只是一个“利”字罢了，加上趋时与逢迎，清中叶以后官场风气之腐败，官吏昏庸之误国，诚非偶然。

读书人的“入笼”现象，始于顺治，盛于康熙。入笼之道，一为科举，一为讲官方认可的“理学”。康熙朝就有位号称理学名臣的李光地，官做得很大，常常是一副最讲忠孝的样子。但若揭老底看，他的高升却有相当一些出卖人的成分。

三藩乱起正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其时李光地回籍省亲，赶上耿精忠在福州起事，李与陈梦雷合谋一次投机：一面由陈在福州投顺耿精忠，一面由李以二人联名用蜡丸上奏朝廷，表忠献策，企图左右逢源。蜡丸书是送到了朝廷，但李光地却未署陈梦雷的名字，照他的打算，密疏独上，如耿精忠成功，陈梦雷已不会计较，若耿失败，则独显自己的忠贞，也避免了陈梦雷一旦出事会牵扯上自己。不论怎么说，后来耿精忠失败，李光